

国家重点学科湖南师范大学英语语言文学

湖南师范大学“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英语语言文学比较与研究

学学半丛书

◎总主编：蒋洪新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翻译学体系构建探析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YSTEM OF
TRANSLATOLOGY: A NEW MODEL

易经
著

国家重点学科湖南师范大
湖南师范大学“211工程”

研究

学学半丛书

◎总主编：蒋洪新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翻译学体系构建探析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YSTEM OF
TRANSLATOLOGY: A NEW MODEL

易经
著

“学学半”丛书编委会

总 主 编：蒋洪新

编委会成员：（按汉语拼音排序）

白解红 陈云江 陈忠平 邓颖玲 黄振定

蒋洪新 蒋坚松 石毓智 肖明翰

总 序

《论语》开篇云：“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朱子语类》写道：“读书，放宽著心，道理自会出来。若忧愁迫切，道理终无缘得出来。”以这两位先哲的名言作对照，我校国家重点学科英语语言文学的全体团队人员在岳麓山的美丽风景中，“放宽著心”，满腔热情地将自己教学与科研的体会变成学术成果，这无疑是件令人愉悦的事。

学者在希腊语中的意思即“忙碌的闲人”，他们在闲暇中忙碌自己的思想与智慧。《清静经》曰：“人能常清静，天地悉皆归”，雷震诗云：“草满池塘水满坡，山衔落日浸寒漪。牧童归去横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黄昏向晚，牧童横身牛背，信口吹笛，好一幅诗意盎然的乡村图景！若学人能像牧童那般信自悠闲，定能写出像样的作品。可惜，随着工业化的脚步，世人包括学者越来越忙碌，闲暇的思考与阅读于他们弥足珍贵。亚里士多德曾说：“我们工作是为了休闲”，此话对今天“能量崇拜以及行动狂热”（美国批评家白璧德语）的大学似乎成了日行渐远的理想。故美国哲人爱默生在美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感叹说：“迄今为止，我们的周年庆典仅仅是一种友善的象征而已，它表明我们这个民族虽然过分忙碌，无暇欣赏文艺，却仍然保留着对文艺的爱好。尽管如此，这个节日也是值得我们珍惜的，因为它说明文艺爱好是一种无法消除的本能。”这些话对当今的中国学术界以及体制化的大学具有一定的反省作用。本套丛书的出版得到了国家重点学科和“211工程”重点学科的资助，让处于浮躁时代与重压状态的学人免于奔波与忙碌之苦，他们得以专心自己的创作与研究，虽不能像牧童那般悠闲吹笛，但至少在整个写作与出版过程中能放宽心境，写出他们自己满意的作品。

曾国藩论读书之道时说：“涵泳二字，最不易识，余尝以意测之，曰：涵者，如春雨之润花，如清渠之溉稻。雨之润花，过小则难透，过大则离披，适中则涵濡而滋液；清渠之溉稻，过小则枯槁，过多则伤涝，适中则涵养而兴。泳者，如鱼之游水，如人之濯足。程子谓鱼跃于渊，活泼泼地；庄子言濠梁观鱼，安知非乐？此鱼水之快也。左太冲有‘濯足万里流’之句，苏子瞻有夜卧濯足诗，有浴罢诗，亦人性乐水者之一快也。善读书者，须视书如水，而视此心如花如稻如鱼如濯足，则涵泳

二字，庶可得之于意言之表。”学者能达到涵泳境界需要长期积累，还需要道德学问的气象，此方面我校开拓者钱基博、钱钟书堪为楷模。1938年日军大举入侵我中华内陆腹地，为培养师资与抗战军政干部，国民政府遂于湖南蓝田创立国立师范学院，是为我校前身。当时一批大学者云集我校，其中钱基博、钱钟书父子最引人注目。钱基博为我校中文系首任系主任，他有感于湖湘先贤“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在国师写出《近百年湖南学风》一书，以百年变化寄托历史兴亡，唤起国人抗敌斗志。钱钟书为我校外文系首任系主任，他在湘西穷山僻壤，孤独艰辛，诚如所言“如危幕之燕巢，同枯槐之蚁聚。”但他处乱不惊，沉潜学问，构思小说《围城》，并写出大半《谈艺录》。钱氏父子在我校开创之初的垂范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湖南师大人。这套丛书秉承这种涵泳精神的灵光。两位钱先生的境界，我们虽难以企及，但值得我们学习与效法，如《史记》所云：“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学记》写道：“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兑命》曰：‘学学半’其此之谓乎！”该丛书涉及英美文学、比较文学、文化研究、翻译理论与实践、语言学、英语教学等诸多领域，所收录的著作大多是教与学过程中诞生的成果，有的是各方向学科带头人多年积累的成果，有的是教师在教学实践中新的体会，有的是青年教师的博士论文扩充的论著。尽管各自研究的题目不同，但都跟教与学相关。教学相长，永无涯也，该丛书既是科研成果的汇总，又是相互的永远激励。故该丛书名“学学半”。

是为序。

蒋洪新

于长沙岳麓山，二零零九年六月

序一

我和易经博士结识于2009年初冬。其时，我应邀主持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会。会前和会后的见面，我们俩跳过了常人一般的寒暄，径直聊起了翻译以及与此相关的话题，谈天说地，相谈甚洽，从而结下了一段文字因缘。这段因缘的直接结果便是此时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篇序文。

月前，易经博士把他的专著《翻译学体系构建探析》的修订稿发给我看，我近半年多以来诸事缠身，几乎没有读书的时间，然而这部书稿却深深吸引了我。该书回顾并梳理了中外翻译学自诞生之日起的蹒跚起步、探索发展、艰难前行、直至稳健发展的完整成长样态，以宏大的视角、缜密的逻辑以及丰富翔实的细节描述了翻译学的形成和发展，这部专著既可作为普及中外翻译理论及其历史知识的教材，又可为翻译理论研究提供切实的指导，其内容之充实，功力之深厚决非一般率尔操觚者可比。过去人们形容难得的作品，常说如“空谷足音”。现在出版物充斥市场，固然不是“空谷”，但像这样投入大量心力的书，也还应该是大家期待的“足音”。

书中所传递的历史观是令人赞许的。它用以论带史、史论结合的形式，阐释了这样一个道理：一个国家形成怎样的翻译理论研究形态，并不取决于学者个人的主观愿望，它是历史的选择，由各国客观存在的历史条件和现实发展状况决定，必须适合本国国情、民族特点和文化传统。可以说，本书第一次清晰而全面地概述了中外翻译理论研究的“前世今生”，各部分内容之间联系紧密，读来一目了然。作者着力在中外翻译学的形成过程方面下笔墨，摒弃了概念式的知识灌输和刻板的理论教诲，而注重追根溯源，以开放型的思维辩证地看待中外翻译学在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同时将目光投到时刻变动的复杂的学术格局中，动态地表现了翻译学自身发展的曲折历程。全书的研究建基于整体的辩证观，循着“缘起一定位一方法一体系构建”的线索，通过研讨翻译学形成的历史基础和现实条件，辩证地认识翻译实践、翻译学的性质及翻译学在人类科学体系中的地位，并整体而系统地剖析翻译研究及译学构建的根本方法，从而合乎逻辑地推导并系统地描述译学体系的构造，有较强的理

论性，分析鞭辟入里，深刻阐述了翻译学的建立是社会的需求和学术发展逻辑的必然结果，这对于引导读者如何以正确的视角和观念看待当下中国的翻译理论研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本书文字建立在大量的理论研究史料查阅的基础上，作者对这些材料进行加工、整理，融合了多家学者的观点后又谈出了自己的见识，使得全书脉络清晰，行文真实、自然。作者既在重现历史，又在书写历史，有研究的客观严谨，又不乏文字的流畅细腻。众所周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大为不同，具有地域性。这是因为，自然现象虽然变化无常，但是现象背后的规律，则是古今如一。而人文社会科学则不同，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人文社会科学都不完全相同，如英、美、法、德等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方法及所研究的内容和问题均有较大的差异，各有偏重，各有自己的传统和特色。企图把西方的理论、方法及所研究的主题原封不动地移植到中国，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科学的。值得一提的是，在研究翻译学在中国的形成史这一过程中，作者加入了许多“类比性”元素，在历史转折的关节点上下了功夫。翻译学在中国的形成史在作者的笔下被赋予了生命和活力，他饱含深情、激情洋溢地描绘了气势宏伟的历史图景。可以看到，作者对史料的选取融真实性和可读性为一体，许多细节的描写与运用都有助于还原当时的历史生态，提升了读者体悟翻译学形成的学术环境的真切感。质言之，易经博士的《翻译学体系构建探析》一书给了我们很好的引导，值得感谢，也值得我作一推荐。

是为序。

张柏然

2012年5月1日改定于
南京龙江寓所

序二

本书作者易经同志是我指导的博士生。他在自己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精心修改完善而成本书。借此付梓之际，我自然要说点什么。

在西方，以 1972 年霍尔姆斯的《翻译研究的名与实》一文宣读为标志，可以说现代译学呼之而出了。在该文中，霍氏提出了他的翻译研究图示，该图示经图里等学者的发展，在西方一直沿用。后来虽然也有人对它提出了质疑和修正，但这一体系图示大体为世界译学界所接受和认可。客观地说，霍氏的图示仍流于简略，而且还有诸多的领域尚未涵盖进来。加之霍氏本人及列维、利弗维尔等一批译学研究界顶尖级学者过早地离开人世，现代译学内的诸多问题尚未思考完好，体系还有待建立，给世人留下了诸多发挥的空间，同时也带来了不少的问题。正因如此，近十余年来，围绕着翻译学的建立问题，国内译学界展开了较多的讨论。一些权威学术期刊如《中国翻译》等杂志纷纷开辟专栏，讨论翻译学体系或中国翻译学的建构问题。一个突出的事实是，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我国翻译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关于“翻译学该不该存在”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和对“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这一关乎翻译本质问题的争论交织在一起。这场讨论同样引起了本书作者的极大关注。他在攻读博士学位之初便对相关文献有全面涉猎，发现不少研究者得出的结论还缺乏说服力。在听取本人意见之后，他基本确定了自己的论文思路，即寻求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参与这场讨论，同时为了体现学科领域研究的最新趋势和上述问题研究的必然结果，把对翻译学体系的构建确定为全文的中心任务。这一课题的理论及现实意义无疑是十分重要而深远的。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作者终于撰成其博士论文。再历经近两年时间的修改，终于形成眼下这部书。该书的脉络是：从论述翻译学建立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必要性出发，探讨翻译实践和翻译学的根本性质，这样我们便可以为翻译学进行全面而恰当的定位。这些问题的解决是译学体系构建的大前提——承认译学的存在并对其有了正确定位，才谈得上进一步探讨体系的具体构建问题，接着讨论译学理论和译学体系构建的方法问题。方法对头，体系的构建才会科学、合理。该书最后提出了一个新的译学体系构想，详细分析了体系各个分支之间的关系，总结了各个

分支中具体课题的已有成果，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归纳起来，这本著作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

(1) 全面论述翻译学建立的历史基础和现实需要。无论中西方，有记载的翻译活动都可上溯到两千多年前。期间，涉及翻译实践的言论、观点及理论接踵出现，蔚为大观。作者对这两千多年的中外翻译理论史进行系统的梳理，搜索其脉络，总结其异同，令人信服地阐释了翻译学建立的历史必然性即逻辑必然性。同时还结合当今翻译实践，有力地阐明了建立翻译学的现实必要性。

(2) 探讨翻译实践和翻译学的性质，对翻译学给以恰当定位。翻译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其学科定位仍未有公论。作者首先分析了文艺学派、语言学派、文化学派和信息学派几个最具代表性的翻译研究学派对翻译学给出的定位。但对翻译学进行正确而合理的定位，最重要的是必须对翻译实践活动的本质及由此而决定的翻译学的本质有全面的认识。本书从语言本身人文性的主要属性出发，推及翻译实践的人文性的根本主导性，并进而推及翻译学的人文科学属性。作者比较全面地描述了翻译学的学科特点并郑重地呼吁，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唯科学论”和“唯技术论”大行其道的今天，必须更加重视翻译学的人文性。能发出这样的声音，在国内译界是不多见的。

(3) 论述翻译研究和译学构建的方法。本书较为深入地分析了规定和描写两种方法，论证了它们作为翻译研究和译学构建的基本方法的辩证统一。当代许多翻译研究者都极力推崇描写的翻译研究方法。但作者全面揭示了规定和描写两种方法的积极意义及片面运用的弊病，并试图从语言哲学的高度论证语言本身的规则性和创造性的统一。由此，扩展到翻译作为特殊语言活动的双语转换活动，也可以合乎逻辑地推论其规则性和创造性的统一，翻译实践本身的规则性和创造性的统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翻译学科是一门集稳定性和动态开放性于一体的经验学科，对之进行研究应该综合运用规定和描写的方法。这样就揭示了规定与描写的统一结合运用是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是译学研究和构建的根本方法。更有价值的是，结合翻译学以人文性为主导的根本性质，作者中肯地指出，在坚持两种方法统一的前提下更应发挥描写方法的优势。这样的认识，显然是十分独到的。

(4) 提出全新的翻译学体系框架的设想。作者在研究国内外几位著名学者的有关理论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地提出了自己的译学体系构想。作者构建的这个由“引论—史论—本论—实论—元理论”几部分构成的

译学体系概念清晰、严明，体系框架结构合理地反映了翻译研究领域的全貌。体系中各个分支的划分也很严谨，各分支共同构成了一个合乎逻辑、彼此联系紧密的系统——这样一个新的译学体系框架令人耳目一新。

读罢全书，我有几个明确的感觉：作者拥有大量与本研究相关的一手资料，在研究中，他表现出了极强的文献综述、整理和分析能力；作者拥有很强的整体系统思维能力，在具体论述的过程中展现出很强的思辨能力；在许多问题上，作者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当然，“译学体系构建”是一个十分宏观庞大的课题，在这样一部二十多万字的著作中显然无法彻底完成。书中研究的问题还只涉及到译学构建的某些方面，作者的论述也无法做到面面俱到。而且就全书的理论基础而言，似乎还可以更多地吸取现代西方译学的一些最新理论，或许会更有说服力。

不过瑕不掩瑜，总体来说，该书论点鲜明，论据充分，论证合理，结论可信。其特点是学理性强，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它向人们立体而生动地呈现了一幅关乎译学理论体系构建的种种课题的图景。书中的思想是作者刻苦钻研的结晶，也必定能给其他从事这一课题研究的学者以一定的启发，当然也必然引起更多人对译学体系构建的关注。这是国内译学界尤其是翻译方向硕博生非常值得一读的一本书。

愿作者能对本课题有更多更深刻的研究，愿作者在学术道路上取得更多的成就！

“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

黄振定

2012年5月于长沙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翻译学的建立——历史的必然和现实的必要	6
第一节 翻译学建立——历史的必然	7
一、中国翻译理论发展历程	7
二、西方翻译理论发展历程	29
三、翻译学的建立是历史的必然	42
第二节 翻译学建立——现实的必要	46
一、翻译实践的全面繁荣——翻译学创生的基础与源动力	46
二、翻译教学的蓬勃开展——翻译实践和理论发展的 智力源泉	49
三、相关学科的发展——翻译学创生的外部条件	53
第三节 翻译学的创生	58
一、翻译理论研究的拓展和深化	59
二、翻译学——一门新兴学科	66
第二章 翻译学的定位	72
第一节 主要学派的翻译学定位思想分析	72
一、文艺美学派翻译研究定位的反思	73
二、语言学派翻译学定位的反思	75
三、文化研究派翻译学定位的反思	81
四、信息传播学派翻译学定位的反思	88
第二节 翻译实践及翻译学的根本性质	93
一、“科学”与“艺术”之争及其解决途径	94
二、“科学”、“艺术”及二者的辩证关系	96
三、翻译实践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98
四、翻译学的“科学论”与“艺术论”的统一	111

第三节 翻译学的定位及其学科特点	122
一、翻译学的合理定位	123
二、翻译学的学科特点	136
三、重视翻译学的人文性	143
第三章 翻译学的构建方法	148
第一节 唯物辩证法——翻译学构建的方法论基础	148
第二节 翻译学的构建方法——规定与描写的统一	150
一、演绎和归纳的辩证统一	151
二、规定性的方法	152
三、描写的方法	156
四、规定与描写的统一	167
第四章 翻译学体系框架构想	179
第一节 现有译学体系简评	179
一、国外有代表性的译学体系及其评析	180
二、中国有代表性的译学体系及其评析	195
第二节 译学体系构想及其内部关系	211
第三节 译学体系简述	214
一、译学引论	215
二、翻译史论	217
三、翻译本论	232
四、翻译实论	286
五、翻译学元理论	299
结语	303
参考文献	305
致谢	316

引言

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有记载的翻译活动¹都可上溯到两千多年前。毫无疑问，翻译活动实际开始的时间远远早于人们开始对它进行记载的时间。只要操不同语言的人有互相交流的需要，而他们彼此又不懂对方的语言，那么翻译就是必要的途径之一。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不计其数且内容纷繁复杂材料被翻译或重译。人们（译者/非译者）从不同角度对翻译实践发表见解，涉及翻译实践的言论、观点及理论接踵出现，蔚为大观。然而，虽然翻译实践活动源远流长，并且日益呈现愈加繁荣的局面，虽然涉及翻译的论说可谓汗牛充栋，但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身份在 20 世纪中期以前却一直没有确立。这中间即有客观的历史原因（客观历史条件不成熟），也有译界研究者自身的主观原因（译界研究者的主观意识未觉醒）。

这种状况在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伴随着现代语言学等诸多学科乃至现代科学技术的长足发展，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速，翻译领域，特别是翻译的理论研究和学科构建领域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革。对翻译实践多视角、深入的审视为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翻译研究者不仅关注双语转换的技巧等微观层面的问题，而且还在翻译实践及翻译学本身的性质、学科定位和学科构建等宏观问题上开展建设性的探索工作。

¹ 在汉语中，翻译是一个多义词，可指翻译活动/实践，可指翻译职业，可指译文，也可指整个翻译事业，基本对应于英语中的 translation。谈到具体的翻译操作行为时一般采用翻译活动/实践这一术语，对应的英文是 translating。

2 翻译学体系构建探析

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就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国外如奈达、纽马克、穆南、威尔斯、费道罗夫和科米萨罗夫等都指出过“翻译是一门科学”,奈达、威尔斯、费道罗夫、巴尔胡达罗夫、卡特福德、纽马克、穆南等人就把翻译学归入应用语言学名下;而前苏联的科米萨罗夫甚至把翻译研究称为翻译语言学;列维和加切奇拉泽则代表了翻译的文艺学派,阐发了“翻译艺术”观;法国的“意义认识——再现”学派认为翻译学是建立在心理学与语言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巴斯奈特等人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探索翻译,呼吁建立一门独立的翻译学科。我学者董秋斯早在1951年就明确赞同并论述“翻译是一种科学”的观点,并倡议建立“中国翻译学”,在中国翻译发展史上最早提出了翻译学科的建设问题。20世纪80年代始,国内的翻译理论研究者也从不同角度对翻译理论和翻译学进行定位,开展多层次的研究,如吕俊提出翻译学应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方梦之认为应建立以译学本体论为基干的普通翻译学;谭载喜提出“翻译是艺术,翻译学才是科学”的观点,指出译学是一门相对独立的综合性科学,等等。

译学体系构建方面,国内有影响的研究主要有黄龙的《翻译学》(1988)、刘宓庆的《现代翻译理论》(1990)、谭载喜的《翻译学》(2000)及许钧的《翻译学概论》(2009)等。黄龙的《翻译学》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国内第一部以《翻译学》命名的专著,分章论述了翻译领域涉及的各方面问题。刘宓庆在《现代翻译理论》中提出了一个包含“内部系统”和“外部系统”在内的翻译学体系构想。谭载喜的《翻译学》讨论了翻译实践和翻译学的性质,对翻译学的体系架构进行了描述。许钧的《翻译学概论》在把握翻译学现状和发展的基础上,融合中西视野,对翻译学主要流派作了精要的归纳与评述。该书以翻译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为中心,采取中西比较的方法,凸显翻译学的内涵和学科特色,并采用历史、发展的目光审视与思考翻译问题,注重揭示理论发展过程中各种流派或理论之间内在的、历史的联系。书中还专门讨论了翻译学的体系问题。国外影响较广泛的译学体系构想有霍尔姆斯在“翻译研究的名与实”(1972)一文中提出翻译学宏观体系结构、威尔斯在《翻译学——问题与方法》(1982)一书中提出的译学理论框架以及巴斯奈特在《翻译研究》(1980)中描绘的译学研究的结构体系及具体研究内容等。这些学者的论著加深了人们对翻译学学科性质、学科地位及学科体系结构的认识,为翻译学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

毋庸置疑,当代的翻译研究已经由就翻译论翻译或就译例论译例的

单纯经验主义或单纯翻译批评式研究逐渐发展为跨学科、多视角的研究。人们在继承传统翻译研究精华的基础上，更多地关心翻译与文化、翻译与社会等问题，试图寻找译作生成背后的深层机制。所以说，在两千多年的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的积淀基础上，随着人类知识水平和对整个世界的认知水平的发展，随着现代语言学及相关学科的繁荣，翻译研究这门学问渐渐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综合学科——翻译学。翻译学的建立将使翻译实践、翻译理论走出传统的以主体的自我感受为本的狭小范畴，步入更为广阔的领域。译学的建立将使翻译研究具有系统性，方法上更具科学性，功能上更具指导性和实用性。翻译学的各种理论、翻译学研究的对象、翻译学的研究范围、翻译学课程体系和教材建设、翻译学的研究队伍等都将得到很大发展。翻译领域的发展进而也会推动其他与之相关的学科的进步。

不过我们还需看到，实际情况并非尽善尽美。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人们对奈达的对等翻译理论提出质疑，尤其是在奈达本人否定了自己的翻译“科学”论之后，翻译研究领域呈现出一派繁荣却又稍显无序的景象。有的研究者否定翻译学的客观存在或存在的价值，有的学者研究翻译中的“异化”和“归化”，还有的研究者讨论特殊的翻译现象，如黄忠廉的“变译理论”。更多的研究者则把目光转向一些新兴学科或新的文化思想，从新视角出发研究翻译——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解构主义翻译理论、诠释学翻译理论、目的论、文化学翻译理论、描写主义翻译理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乃至“食人主义”翻译理论等等。这些理论各自都有不少的支持者，也就相应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在文化学翻译理论方兴未艾之时，更有如根茨勒 (E. Gentzler) 和提莫志客 (M. Tymoczko) 这样的学者发出了翻译研究已从文化转向 (cultural turn) 过渡到权力转向 (power turn) 的强音。可以看到，西方翻译研究范式的转变“带有明显的横向开拓特征”，即“文化外求”。乐黛云对此进行了归纳：外求“他种文化”，如借鉴上述巴西食人主义；外求“边缘文化”，如引入女性主义视角；求助“他种学科”，如哲学、语言学、符号学、信息论、美学等。¹ 不过，这些研究或是从不同视角研究翻译（如诠释学派从译者的理解角度、目的学派从翻译实践及译作目的角度），或只是讨论具体的翻译手法（如“归化”和“异化”），而像我们在前面列举的那些

1 乐黛云，文化转型与中国文学人类学，叶舒宪主编《文化与文本》，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年，第 7-8 页。

4 翻译学体系构建探析

学者一样从整体上审视、构建翻译学体系框架的并不多。

我国学者张柏然和姜秋霞认为：“翻译学就是系统地研究双语转换规律，通过描述翻译过程，总结出一定的原则、理论与模式，以解释和预测一切在翻译范畴之内的现象，从而构建一套宏观结构框架加微观操作原则的翻译理论体系。”¹ 一个学科体系框架的建立对于这门学科的发展有着重要的规范性和纲领性作用。条理分明、线索清晰的框架体系的确立能极大地促进学科的全方位发展。本研究便致力于构建这样一个包含广泛的翻译学宏观体系框架，并基于此框架就一些重要的翻译课题发表一己之见。需要注意的是，任何一个学科体系的构建工作都必须先解决一些基本问题，因为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关系到构建的体系本身是否合理和科学。

为此，本书将首先着力阐述翻译学的形成是历史发展的逻辑必然，同时也是现实的要求。译学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一方面要从翻译研究发展史中去寻觅其脉络和必然趋势，另一方面要看这种研究本身是否具备足以使其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各种条件。翻译学独立学科地位的形成是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历史积淀的必然结果，是整个翻译领域发展到现当代的迫切要求。

虽然翻译学已初现雏形，但学术界在翻译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如翻译实践和翻译学的性质，翻译学的归属和定位）上并没有达成共识。我们力图在整体辩证观的指导下，对这些问题给出相对全面、客观的解答。对几个主要学派的翻译学定位的比较和分析以及对翻译实践和翻译学本质的辩证探索，将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翻译学的定位和学科特点。对这些基本理论问题给予回答是构建翻译学框架的前提。

在切实把握翻译学的学科性质和定位的同时，要建立翻译学的体系结构就必须遵循构建科学学科所应遵循的一般原理——系统的辩证观的根本原理及方法论，遵循建立翻译学及其体系所应依据的方法——规定与描写相统一的方法。在构建译学体系结构的过程中，只有坚持这些原则和方法，所构建的框架才能客观地反映译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科学地、动态地推导译学发展趋向，才能具备一个科学体系所应有的稳定性和开放性。

经过古典和近代时期的积淀，翻译研究发展到现当代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经是呼之欲出。众多中外翻译学者为译学的建立作出了不可磨灭

1 张柏然，姜秋霞，对建立中国翻译学的一些思考，《中国翻译》，1997年第2期。

的贡献。遵照文中探索的译学构建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本书将有选择地对国内外重要学者在译学构建方面发表的见解及已经提出的译学体系模型进行综合对比分析。本书最后将借鉴他人思想精华，集中提出作者对翻译学体系结构的设想，详细讨论翻译学领域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力图在译学体系构建问题的研究上有所深化。我们认为，对翻译学体系框架进行深入研究有益于理清当前我国翻译研究的一些纷争，有益于构筑内容丰富、涵盖全面的翻译学系统，对翻译研究起到切实的指导作用，并具体指导翻译实践和译作评价等活动。

本书的研究建立在整体的辩证观基础之上，按照“缘起—定位—方法—体系构建”的线索展开，力图通过讨论翻译学形成的历史基础和现实条件，辩证地认识翻译实践、翻译学的性质及翻译学在人类科学体系中的地位，并整体而系统地剖析翻译研究及译学构建的根本方法，从而合乎逻辑地推导并系统地描述译学体系的构造。

本书的研究完全是探索性的，也是开放的。书中就某些翻译研究前辈的相关思想提出的一些商榷性意见更是探讨性的。由于作者水平所限，对问题的思考也许不那么深入、全面，书中所述难免挂一漏万。我们只是期望本书的研究能促进学界同仁对翻译学科体系构建问题给予更广泛的关注。